

州人民出版社·韶阳编

贺子珍与毛泽东情爱不断

周恩来与邓颖超爱情浪漫曲

刘少奇的贤内助王光美

卓琳与邓小平患难与共

中国第一元帅夫人的情爱

红墙内的 夫人们



红墙内的夫人们

韶阳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 (01) 号

红墙内的夫人们

编 者	韶 阳	责任编辑	吴 力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贵州黔春印刷厂	封面设计	刘苏斌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10.75	技术设计	施福根
字 数	241千字		
印 数	2001—3000		
版 次	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2次印刷

ISBN7-221-02859-1/I·370

定价：5.80元

目 录

无尽的思念

——贺子珍对毛泽东情爱不断 (1)

毛泽东与江青分灶吃饭 (21)

周恩来与邓颖超爱情浪漫曲 (25)

中国第一元帅夫人的情爱 (39)

刘少奇的贤内助王光美 49)

卓琳与邓小平患难与共 (53)

邓小平在浦安修的离婚报告上批示：

这是家务事，我们不管 (112)

毛泽东为他俩当“月老”

——张闻天和刘英的婚恋 (115)

张茜与陈毅的爱情故事 (120)

元帅归去来兮

——记贺龙夫人薛明 (138)

刘伯承“情书”寄汪荣华 (161)

革命者的爱情

——聂荣臻元帅夫人张瑞华 (166)

爱情萌发在延河边

——罗荣桓与林月琴 (169)

承志和我

- 经普椿的哀思 (172)

金子般的爱心

- 蔡畅对李再青一家的关怀 (180)

江山易老人不老

- 记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 (187)

革命文艺剧作家

- 杨尚昆夫人李伯钊 (196)

李莎选择了李立三,也就选择了中国 (200)

罗瑞卿与郝治平的生死恋 (204)

曾志与毛泽东关系渊源深长 (211)

王定国,谢觉哉的人生伴侣 (222)

大将之恋

- 许光达和他的妻子邹靖华 (226)

传奇的爱

- 从“小鬼”到夫人的徐海东妻子周东屏 (252)

刘亚楼的混血儿妻子 ——翟云英 (261)

肖华戎马生涯的最好见证人 ——王新兰 (271)

谭震林与葛慧敏的战地恋爱史 (293)

“战场结伴,相见恨晚”

- 张爱萍将军赋诗赞夫人 (309)

迟浩田夫人青萍与丈夫心心相印 (315)

无尽的思念

——贺子珍对毛泽东情爱不断

从莫斯科坐上火车，到祖国北陲的大城市哈尔滨，有八天的路程。无论谁走在这条路线上，都感到旅途漫长。贺子珍更加感到这段路程太长。她自从上了火车后，神经一直处在极度兴奋之中。

她思绪万千。她想念自己的祖国，阔别九年，现在变成什么样？她想念昔日的战友，现在都在何方？他们是怎样南征北战，为解放全中国而战斗？她怀念她的哥哥贺敏学和妹妹贺怡，他们又在哪里？还活着吗？她还怀着一种感激之情想到毛泽东，不是他的支持和关心，她将永远流落他乡，回不了祖国。他现在身体怎样？指挥千军万马，一定更忙了吧？

她也想到自己，刚出国时多么天真幼稚，一心想读书，回来后好多做点工作。结果，书没有读好，白白荒废了九年的光阴。现在看看同志们，都前进了，都有了贡献，自己却一事无成，她感到太惭愧了。贺子珍是个乐观的人，她没有让自己沉浸在过去的无限哀痛之中，因为她充满了希望，看到了未来。她正走在归国的途中，马上就可以投身到火热的战斗中去。她决心用加倍的努力去工作，弥补过去的损失。

火车越往前走，贺子珍的情绪越高，他的话变多了，笑声也多了。和他们同行的，有一位被炮弹片打伤了眼睛的同志，到苏联去医治，治疗没有效果，又回国了。他双目失明，

行动很不方便。贺子珍看到这种情形，主动去照顾他，一路上为他端茶端饭，还扶他上厕所。这位同志过意不去，贺子珍却笑着说：

“这有什么，同志间互相帮助嘛！”

人们从这些细小的动作中，似乎又看到了长征时期那个对同志满腔热情的贺子珍。

列车终于到达哈尔滨站，李富春等同志已经在车站迎候了，他握住贺子珍的手，亲切地问道：

“一路上身体可好？”

“很好，谢谢。”贺子珍高兴地回答说。

“路上辛苦了，好好休息吧！”

“不用休息，我不累。我请求组织上尽快安排我的工作。”

“你的住处已经安排好了。你生活上有什么需要，可以提出来，我们去办。”李富春有意躲开她要求工作的问题。

“不，我个人生活没有什么要求，我只想早日工作。”贺子珍重复了她的要求。

但是，东北局组织部的同志发现，贺子珍连最必需的日用生活品都没有。除了身穿的衣服以外，她几乎没有换洗的衣服，娇娇也只有随身的一套衣服，脚上穿的鞋，已经露出了脚趾。人们不难看出，贺子珍这几年在国外的生活，过得多么窘迫！组织上主动给她和娇娇添置了棉衣，还特地为贺子珍做了一件棉大衣。娇娇也有了一双新皮鞋。

不懂事的娇娇穿上了新的皮鞋，心里不知道有多美。她故意重重地走路，让清脆的皮鞋声吸引妈妈的注意，让妈妈看看她的新皮鞋有多漂亮。可是贺子珍板着面孔，皱着双眉，一点也不喜欢。她用俄语对娇娇说：

“把新鞋脱下来，还给组织上。我没做什么工作，给组织上增加了那么多麻烦，怎么好接受那么多的照顾？你那双旧鞋补一补，还可以穿。”

娇娇从小在国外，已经不讲中文了。她知道妈妈对她是很严格的，只得乖乖地把新鞋脱下来，重新穿上旧的。

贺子珍对组织给予的关怀，的确很感激。娇娇不懂中文，不会说中国话，组织上专门为她物色了一位老师。组织上还陪她参观了已经解放的哈尔滨市。这座有小莫斯科之称的现代化城市，到处是一派繁忙的备战景象，贺子珍没有想到，九年前自己在苏联向往人民当家作主的生活，竟然这样快在哈尔滨实现了，而且还将很快在全国实现。她心情激动，更加坐不住了，一再跑到组织部门要求工作。她诚恳地说：

“我工作能力很低，长期没有工作了，我自己知道做不了什么。但是我想工作，想为解放全中国出一把力，随便安排个什么工作，我都乐意去做。”

组织部的同志被她那种恳切的心情深深感动了。他们把她安排到东北财政部，担任机关党总支书记，以后又把她调到哈尔滨总工会干部处。组织上一再嘱咐她：

“你的任务主要是养病，身体好一点，就做一点，不好就休息，千万不要累着了。”

贺子珍尽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满腔热情地去做领导交给的工作。

她十分惦记自己的哥哥和妹妹，还有年迈的父母，不知道他们的景况如何。她给过去认识的老战友肖劲光、肖华等都发去了电报，请他们协助打听哥哥、妹妹的下落。在老战友们的协助下，贺子珍终于了解到贺敏学的妻子李立英，带

着五岁的女儿小平，已经来到东北，她将到哈尔滨来看望贺子珍。

贺子珍兴奋地期待着，她还没见过这个嫂子。当她们终于见面时，贺子珍马上就爱上了这个比她年轻得多的嫂子。李立英是一位长得很文静秀气的新四军干部，为人爽直、热情。贺子珍一下子就向她敞开了自己的心扉。李立英在东北的那些日子，她同李立英朝夕相处，连晚上都同睡在一张床上，向她倾诉了多年积在心头无人可倾诉的心腹话。李立英发现，贺子珍仍然保持着晚上不睡、早上晚起的生活习惯。

从李立英那里，贺子珍也知道哥哥和妹妹的近况。

贺敏学在红军撤离中央苏区以后，跟着陈毅在赣南打游击。在南雄的一次战斗中，队伍被打散，贺敏学负伤被捕。他设法逃了出来，在一个老乡家养好伤后，就四处寻找部队的下落。他装扮成补鞋匠，挑着担子游街串巷，探听消息。他还曾经给地主家看过鱼塘。无论他到哪里，都做群众工作，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他还曾经领导过渔民同地主作斗争。国共合作抗日以后，他在陈毅的领导下，转战在江西、安徽、江苏一带，打击日本侵略者。现在，他正在山东，同重点进攻胶东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决战。

贺怡在红军长征时已经怀孕，她同毛泽覃留在江西坚持游击战争。由于项英推行“左”倾路线，硬打硬拚，中央根据地很快整个丢掉了。毛泽覃在一次战斗中牺牲。这时，贺怡临近分娩，组织上为了她的安全，让她同她的父母一起，到当时还是根据地的于都一个红军战士的家里暂避。贺怡领着两位老人来到于都时，敌人已经占领于都。原来的县委书记被捕，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贺怡挺身而出，在一片白色恐

怖，而且是同上级党断绝联系的情况下，整顿党的组织，坚持地下工作。西安事变以后，赣南游击队的代表同国民党在赣州谈判，贺怡闻讯，立即赶到赣州，同上级党重新联系上了。以后，她来往于南昌、吉安、广州、韶关等地，活跃在抗日救亡战线上。一九四〇年，假抗日、真反共的国民党特务，在韶关逮捕了她，并对她施以酷刑。她为了保持共产党人的气节，曾吞下金戒指准备自杀。以后周恩来同顾祝同谈判，用俘虏的国民党将领，把她换回来。贺怡到了延安，住进医院。医生说，必须尽快动手术把金戒指取出。按照规定，手术前必须由她的亲属在手术单上签字。当时，贺怡身边没有亲人。毛泽东说：“为了贺怡同志能够多工作几年，这几个字我来签吧！”手术后，她的胃只剩下三分之一，人瘦得只有八十多斤，但她仍然不倦地工作。

听到哥哥和妹妹为革命出生入死，如此悲壮的经历，贺子珍落泪了。她为自己兄妹的英雄行为而自豪，也被他们刚强的革命意志所感动。对比自己，她感动，这九年的岁月虚度了。

李立英还告诉她，在贺怡离开于都以后，父母亲也来到赣州，父亲在江西后方办事处当主任。后来病逝在赣州，是项英给他办的后事，当时子女一个也没在身边。父亲故去以后，母亲孑然一身，很觉凄苦。组织上把她送到延安，想让她跟着贺子珍过日子。不料，她抵延安时，贺子珍已经到苏联去了，是毛泽东照顾她的生活。后来，她病逝在延安，又是毛泽东把她安葬的，还为她立一块石碑。胡宗南占领延安时，把母亲的坟挖了。收复延安后，毛泽东拿出十块银元，请老乡重新把她埋了。

贺子珍听到这里，禁不住失声痛哭起来。好久好久，情绪都平静不下来。这是多么好的一对老人啊！他们把自己的一生，把自己的子女，把自己的资财，全部贡献给革命了。贺子珍为自己的父母感到骄傲，同时也深深地感激毛泽东对她的妹妹、母亲的关怀和照顾。

不知为什么，此时，贺子珍产生了给毛泽东写信的念头。她摊开信纸，思潮翻滚，从何写起呢？一别九年，两个人都饱经沧桑。她有多少话要说啊！她在信中写道，主席，我已经回到中国来了。身体不太好，还在休养，并参加一些工作。我离开中国九年，对国内现在的情况不大了解，我要通过工作来了解情况。她接着写道，我在苏德战争时期，生活很苦，什么都要自己做，劈柴、烧饭、洗衣服、带孩子、种地、织袜子，什么活都要干。开始我不会，后来都学会了。我在苏联的那段日子，比在长征时还要苦。不过，这已经过去了。现在我要好好工作，我正在学习做工会工作。最后她写道，我很感激你对我的妹妹和母亲的照顾，代我尽了姐姐和女儿的责任，我将终生铭记在心。

娇娇也用俄文给爸爸写了一封信。贺子珍把两封信装在一个信封里，发出去了。

毛泽东没有回信，却打了一个电报给娇娇。电报是这样写的：娇娇我的女儿，你的信我收到了。你好好学习，做一个中国的好女孩。爸爸很好。

大约过了一个月，毛泽东派了一个警卫员来，找到贺子珍说：“毛主席想念娇娇和岸青，想把他们接到身边，让他们在那里读书，征求你的意见，同意不同意。”

贺子珍毫不犹豫地说：“既然主席想念孩子，希望他们到

他的身边去，我完全同意，没有意见。”

这位警卫员又到学校去，找到娇娇和岸青，问他们愿不愿意到爸爸那里去，两个孩子都说愿意。于是，他们被带到河北省西柏坡毛泽东的身边，在那里读书。

等到两个孩子一走，贺子珍才感到自己的身边是这样冷落。在苏联的那段生活，使她害怕孤寂，她喜欢人多，喜欢热闹。她知道孩子这次离开她，是到他们的爸爸那里，他们的爸爸也需要他们。但是，她仍然克制不住对女儿的思念之情。于是，她提笔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信里写道：娇娇、岸青到你那里去了，我一个人感到很寂寞。我相信，你一定会把他们教育好的，这不用我说。我的工作很好，身体好一点。请你多注意身体。

毛泽东没有回信。但贺子珍很快收到娇娇的来信。娇娇写道：亲爱的妈妈，你好！我在爸爸这里很好。你想念我吗？我也想念你。爸爸问你好，希望你保重身体。

以后，每年放暑假，毛泽东都派人把娇娇送到贺子珍那里，让他们母女一起住一段时间。每次，毛泽东都让娇娇给贺子珍捎来许多食物，包括各种水果。娇娇每次来，贺子珍总要详细地打听娇娇在那里生活的情形：吃得好不好？生活好不好？玩得好不好？同时还要仔细了解毛泽东的身体、生活和工作情况。当她听说毛泽东一切都很好时，脸上露出了宽慰的笑容。

从延安时起，我们干部就有在周末跳交谊舞娱乐的风气。解放了的哈尔滨，虽然是在辽沈大战前夕，有时也在周末举行舞。大家见到贺子珍身体好些了，偶尔也拉她去跳舞。贺子珍婆婆起舞，风姿不少当年。

在贺子珍家庭发生变故以后，在苏联的同学中，有人对她表示过倾慕之情。这次回到祖国后，仍然有人希望能获得她的爱情。但是，贺子珍都婉言拒绝了。许多人关心贺子珍今后生活的道路怎么走？她有些什么打算？贺子珍自己说：

“我一生只爱一个人，我已经把我的感情给了毛泽东，不可能再爱第二个了。”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不可阻挡之势，解放了北平、天津、南京、上海，并为解放全中国发起了全面的进攻。毛泽东从西柏坡迁居石家庄。他在这里见到了贺子珍的妹妹贺怡。两个人谈到了贺子珍的情况。毛泽东说：

“你让贺子珍到这里来，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了，我们还是按中国的老传统办吧！”

毛泽东没有说，按中国的老传统办，具体怎么办，但贺怡明白他的意思，就是要恢复同贺子珍的夫妻关系，承认历史上造成的这个事实。

这时，江青正在苏联养病。

贺怡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到哈尔滨去接姐姐。她们乘坐的火车，到了山海关站，上来两个同志，自称是组织部派来的。他们说：

“你们不能进石家庄，只能南下，到你们哥哥那里去，这是组织决定。”贺子珍一听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不让进石家庄，这是指的她，而不是贺怡。有人从中阻挠她和毛泽东的重逢。她沉默着，没有说话。贺怡为姐姐力争。但这个决定是不可更改的。那两个人板着面孔，毫无商量的余地，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她们只得转车来到上海，住到哥哥贺敏学的家里。

这件事对贺子珍当然是个打击，但是她正确对待了。她接受谭震林对她工作的安排，到杭州市妇联担任副主席的工作。

对于贺子珍没能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来到他身边，毛泽东是怎么想的呢？贺子珍不知道。但是她了解毛泽东，他是个组织纪律性很强的人。即使组织的决定是不正确的，甚至是错误的，他也首先是服从。这个所谓组织部门的意见，不反映毛泽东的意见，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能够以组织部门的意见左右毛泽东决定的，是什么人呢？毛泽东以后又将怎样来处理这件事情呢？作为毛泽东弟媳的贺怡，决定要把事情弄清楚，弄到底。她要再面见毛泽东，询问、了解这件事情，也只有她，才能挺身为姐姐说话。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贺怡在车祸中身亡。

这时，贺怡已经被安排在吉安地委工作，她想要在去单位报到以前，把当年贺子珍和毛泽东留在江西的小毛找到，然后带着他再去见毛泽东。她先回到赣州，把毛泽覃遗腹子贺麓成接了来，然后再去办这件事，她连夜赶路，没料到翻车身亡，贺麓成也身受重伤。

贺子珍知道，贺怡的死都是为了她，她痛苦极了，难过极了。她放下了工作，来到上海，亲自担负起护理贺麓成的任务。她把对妹妹的怀念、对妹妹的爱，都倾注在这个孩子身上了。

如果不是出现这个意外的事故，贺子珍的生活道路是否会改变呢？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预料的。

1950年，贺子珍同哥哥贺敏学、嫂子李立英，联名给毛

泽东写了一封信，感谢他对娇娇的照顾。信中说：娇娇回国时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现在不但会说了，而且会用中文写信了，这都是毛主席教育的结果。信里还谈了他们三个人的工作安排问题。这封信是李立英执笔的。

毛泽东很快回了一封信，写道：希望贺子珍保重身体，顾全大局，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

毛泽东在信中所表达的意思，贺子珍完全领会了。她要回到毛泽东身边的愿望不能实现了。

1954年的一天，贺子珍正在上海哥哥的家里休息。收音机里播送毛泽东的一次讲话录音。贺子珍听得发呆了。这声音对她来说是多么熟悉呀！她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听到这个声音了。

这时，李立英正坐在她的身旁，一起在听广播。

“毛主席的声音真洪亮。”李立英赞了一句。

“是呀，他的声音很洪亮，跟过去一样。”贺子珍回答说。

收音机把毛泽东的讲话录音播了一遍又一遍，贺子珍就坐在收音机旁，听了一遍又一遍。她忘了吃饭，也忘了睡觉。

第二天早上，李立英起床，发现贺子珍还坐在那里，耳朵贴在收音机上，凝神听什么。

她见到李立英来了，便问她：“怎么收音机不响了，不广播毛主席的讲话了？”

李立英走过去一看，原来收音机一夜没关，已经烧坏了。

从此，贺子珍病了。她茶饭不思，精神恍惚，处在一种有时清醒有时糊涂的状态。毛泽东的声音给他的刺激太大了！她原来已经愈合的心灵的创伤，又重新裂开，在不断流血。在苏联的那段日子，特别是后一段时期，她的精神经受了过重

的打击，再也经受不住新的打击了。

贺子珍生病的消息，很快传到毛泽东那里。他知道贺子珍是为什么病的以后，流下了眼泪。他提笔写了第二封信。听说贺子珍不肯吃药，也不肯看病，毛泽东在信上嘱咐她要注意身体，好好治病。他在信上说，苏医生是个好同志，杨医生也是好的，要听医生的话。他听说贺子珍抽烟抽得很厉害，就在信是劝她说，不要抽那么多的烟，烟抽多了对身体不好。信中，还要求贺敏学代为照顾贺子珍。殷殷之情，溢于言表。

不久毛泽东又派娇娇到上海来，代他探望贺子珍。临行前，毛泽东对娇娇说：你告诉上海的组织，妈妈病了，请他们多照顾，带她去治病。但不要说，她是为什么生病的。

贺子珍看了这封信后，病情竟然慢慢地好起来，她也肯吃药，也肯看病了，还把烟戒了。

毛泽东不时地给贺子珍捎点东西来，有吃的，有用的。他知道贺子珍烧坏了一台收音机，就买了一台当时国内最好的熊猫牌收音机，送给她。有一次，毛泽东还捎来一千元钱。贺子珍用这些钱买了许多日用品，送给在井冈山时期掩护过她的乡亲。毛泽东劝贺子珍戒烟，可是有一回，外宾送给他一条国外的名牌香烟，他打开了一包，抽了一半，突然想起贺子珍爱吸烟，就把那九包没开封的烟，连同抽过的那半包烟，一起包好，托人送给贺子珍。贺子珍收到这些烟后，原来已经戒了烟，又抽了起来。

在毛泽东送给贺子珍的东西中，还有一方淡黄色的大手帕。手帕是旧的，是毛泽东使用过的。贺子珍看到这块手帕，思念之情不能自己。她看着毛泽东的手帕，又提笔写了第四封信。她在信中写到自己对他的怀念。并且说道：你一定要

注意王明这样的人对你的迫害。深受王明迫害的贺子珍，已经造成这样的印象，再也没有比王明更坏、更会整人的人了。在她的观念中，王明成了一切坏人的代名词。

毛泽东收到这封信后，给贺子珍写了第三封信。信上说，我身边绝无王明之流那样的人，我已经把他们下放的下放，送去学习的学习。请你放心。你要好好保重身体，兢兢业业，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

贺子珍也常常通过娇娇，给毛泽东捎东西。毛泽东是湖南人，爱吃南方的青菜，象芥菜，蕹笋这些东西。贺子珍就让娇娇把南方鲜嫩的青菜捎给他。青菜不值什么钱，但礼轻情意重，它表达了贺子珍的一片心。有一次，贺子珍还给毛泽东捎去了一个很精致的骨雕耳挖子。毛泽东是油耳朵，不时要清理耳中的油垢，这个习惯，贺子珍记住了。

贺子珍在身体复原之后，就定居在上海。她又渴望工作了。她觉得，只有工作才能使自己的生活充实起来。她一次又一次地到上海市委去，提出分配工作的请求，但是每一次，都得不到明确的回答。她在上海生活了那么多年，在粉碎“四人帮”之前，除了陈毅在上海当市长时去看过她以外，从来没有市委的哪个领导人去看望过她、关心过她的生活和工作。

贺子珍一个劲地往市委跑，但是她从来看不到市委的负责人，接待她的总是普通的工作人员。

她质问说：“我的身体好了，为什么不给我安排工作？”

接待的人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你们是怕影响不好吗？”贺子珍又问，“毛主席在北京做他的主席，我在上海做我的工作，这能影响他些什么呢？”